

西夏史稿

吴天墀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重庆师

馆

藏

重庆师院图书馆

吳天墀

西夏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成都

封面设计：陈世五

封面题字：刘云泉

西夏史稿

吴天墀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12.25 插页9 字数282千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0册

书号：11118·38

定价：1.60元

前 言

西夏在祖国历史上，曾是先后与宋辽、宋金鼎立约近二百年之久的王朝，它的存在，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元人修史时，对宋、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编纂成纪传体的所谓“正史”，而独于西夏，则仅据三国旧史草率编成分量无多的传记（《宋史》有《夏国传》，《金史》有《西夏传》，《辽史》则称《西夏外纪》）。托托等人既未能检出耶律楚材于蒙古灭夏时所收得的大宗文献^①，如实录、谱牒^②、档案、文书等类；也未能充分利用宋人有关西夏的著作，如孙巽的《夏国枢要》、刘温润的《夏国须知》，以及佚名史学家的《赵元昊西夏事实》、《西夏事宜》、《西夏杂志》、《契丹夏州事迹》^③等书，并其他零散纪录，撰成拥有足够篇幅的西夏专史。这种作法带来的不良后果，最严重的是使有关西夏的丰富史料，湮没得百不一存；其次，也使宋、辽、金、元诸史少了一部足供互相参稽的珍贵文献。这对于祖国历史的研究，实不能不认为是一件无可弥补的损失。

清代乾隆、嘉庆以来，有不少的学者曾就前代文献作过拾遗补阙的功夫，想给散亡数百年的西夏历史进行部分的复原工作。如洪亮吉有《西夏国志》，周春、王昙、秦恩复三家各有《西夏书》，徐松有《西夏地理考》，无名氏有《西夏志略》，陈崑有《西夏事略》的撰作^④都是。不过这些著作，有的没有完成，有的

没有刊布，到现在连存亡也不清楚。因此它们对于学术界可说完全没有或只有很小影响。在少数完成并已刊布的西夏史著作中，以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四十二卷和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一向成为我们学习西夏历史必要的书籍。

但所有这些关于西夏历史的著作，因受时代的局限，不免有一个共通的缺点，就是它们采取的是封建主义的传统史学的观点、方法和体例，并用文言文写成，考据上也不免有疏略抵牾的地方。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都已难于适合今天一般读者学习上的需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里面，为了更好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继承祖国各民族的历史遗产，对于文献散佚，一度长期被人忽视而近年受到中外学者注意的西夏历史，实有加以大力研究的必要，因此作者才鼓起勇气把多年前编写的《西夏史稿》重新修改出版。但限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在编写过程中曾遇到不少困难，而最感棘手的是西夏史料散亡得百不一存，其倖存的东鳞西爪般的史料，又差不多都是附丽于两宋统治阶级的学者在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支配下，采取歪曲的形式反复折射出来的西夏统治阶级的历史活动，这就影响到本书，使得它暂时只可能是大汉族主义观点未尽涤除的西夏统治阶级的活动史，它与作者预想中的一部真正西夏人民的历史是大有距离的。其次，前人关于西夏历史的未刊稿本和散藏国内外的原始文献，以及近人在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地下资料^⑤，除少数曾由学术界前辈称引、翻译、介绍的部分外，前两次属稿时囿于闻见，无法加以利用。这次再度修改，参考了文物考古的新资料，补入地下新材料不少；但终究不能说主要困难已被克服，所以这

部史稿显然只不过是西夏史撰作上的一个不成功的尝试而已。

本书的编写，主要在给高等学校学生作课外读物，给中等学校教师作教学参考用书。在史料搜集的方面，也可供有志钻研西夏历史的读者作前进的桥梁。

在本书的编制问题上，我要向读者说明如下几点：

一、西夏史料主要散见于各种旧籍。本书在陈述史实，特别是征引旧籍时，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以便读者进行核对，纠正错误。

二、对于不便叙入正文的补充性资料和考证性文字，悉依重要程度，适当载入附注。

三、本书在行文中摘录旧籍的文字，一般是浅显易懂的。摘录的用意，在于避免不必要的多一度转述而更能直捷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其次，也让读者适当接触我国古典历史著作，以便于对中国历史（自然西夏历史也包括在内）作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必得申谢的一点是，本书虽属稿本性的东西，但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却颇为不少。它的初稿写成于一九五五年，当时系在徐中舒、蒙文通、王恩洋三先生的鼓励和支援下进行编写的。一九六三年又作了一次修改，初稿及修正稿俱承徐中舒先生于百忙中惠予校阅，并作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指示；在编写和两次修订过程中，胡瑞祥同志对本书各稿在体例与文字的表现形式上既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还协助了部分工作。嗣后本书稿本一直搁置达十五年之久，现在才有机会再度修改出版与读者见面；出版前，又承徐中舒先生作最后一次校阅指导，并拨冗撰写序文，实为本书增色不少。又本书原只是一种业余写作，在两次进行修订中，除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种种协助外，四川大学历史系领导上也对作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没有以上各方面的热情支援，本

书的完成和出版是不大可能的。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诚恳地请求读者不吝指教批评，以便本书中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能够得到改正。

吴天墀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注 释】

- ① 见《元史·耶律楚材传》。
- ② 《宋史·夏国传》记西夏于“绍兴三十一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金等为学士，俾修《实录》。”《金史·西夏传赞》有“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的话，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二，谓世昌“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证明西夏是有实录、谱牒一类著述的。
- ③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载有《赵元昊西夏事实》及《西夏事宜》二书；《西夏杂志》见尤袤《遂初堂书目》地理类著录，“志”或作“记”。又《契丹夏州事迹》一卷，见郑樵《通志·艺文略四》著录，夏州即西夏。
- ④ 上举各书，请参阅本书附录四：《西夏史文献目录》。
- ⑤ 明姚士粦《见只编》曾记：“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一‘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此“夏国书”从其能为夏亡三、四百年后一普通汉族人士得以看懂的情形推断，它可能是用汉文编撰的西夏史著作。又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李氏所藏西夏实录之为原本或译本，均有可能。近人柯劭忞为戴锡章《西夏纪》写的序里说：“犹忆光绪辛巳（公元一八八一年），予与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从姚士粦、钱谦益以及柯劭忞留下的三条记载及清末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现看来，有关西夏的历史文献，今后还可能继续有所新获。

目 次

第一章 西夏王国的形成

- ✓ 一 生息在祖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 1
- 二 在党项羌中成长起来的拓跋氏政权 15
- 三 西夏王国的出现 27

第二章 与北宋、辽鼎立的前期西夏王国

- 一 前期西夏王国的政治概况 49
- 二 西夏建国初期的对宋战争 59
- 三 夏、宋和约的成立 68
- 四 夏、宋战争的再起 79
- 五 西夏的对辽关系 92

第三章 与金、南宋鼎立的后期西夏王国

- 一 后期西夏王国的政治概况 104
- 二 西夏对金和南宋的关系 112
- 三 蒙古的进攻和西夏的灭亡 122

第四章 西夏的社会形态

- 一 西夏的社会性质 139
- 二 西夏的经济状况 170
- 三 西夏的政治军事制度 200
- 四 西夏的宗教和文化 220
- 五 西夏的社会风俗 246
- 六 西夏文字的创制、使用和流传 264

结束语	283
附录一 西夏拓跋氏世系表	292
附录二 西夏州名表	293
附录三 西夏大事年表	306
附录四 西夏史文献目录	338

第一章 西夏王国的形成

一 生息在祖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

公元九世纪末期，祖国的西北地区出现过一夏州地方政权，并于公元一〇三八年（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开称帝，发展为割据性的西夏王国。在一百九十年的长时期内，西夏王国与辽、金先后成为与宋代鼎峙的政权，屹立于方二万余里的广阔土地上，直到公元一二二七年（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始为新兴的蒙古所灭。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宋人称西夏。《隋书》和《旧唐书》对党项羌人的早期历史活动，有着大体相同的记载。《隋书·党项传》说：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獠猴种。东接临洮（今甘肃省临潭县）、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西拒叶护（案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人沙畹谓叶护为西突厥之别称），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犂牛尾及牯犛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犂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秽蒸报’，于

诸‘夷’中为甚。（《旧唐书·党项传》说：“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①

以上这段文字，扼要地记载了党项羌人的早期历史活动情况。但它把我国古代北部游牧民族所常行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的收继婚制（这种婚制原是氏族群婚制破坏以后的残迹），诋斥为“淫秽蒸报”，则系当时汉族史家局限于封建社会伦常制度和民族偏见，不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习惯所产生的错误，这是必得附带指出的。

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广布于西北地区的羌族中的较晚兴起的一支。历史文献记载他们在南北朝末期（公元六世纪后期）才初露头角。他们的居住中心，起初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尚书·禹贡》叫作析支，北音读析如赐，《后汉书·西羌传》就作赐支；是在北纬三十四度黄河曲折北流之处）一带地方。到唐代初年，活动范围扩展，“东距松州（故治应在今四川省松潘县以北），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在今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吐谷浑（在今青海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其中心则在青海湖附近）”（《新唐书·党项传》），分布在一个辽阔的草原区域上面。他们按照从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当时党项羌中的著名族姓，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②、米擒氏（《宋史·党项传》作来擒氏）、拓跋氏等八族。内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在党项羌中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新、旧《唐书·党项传》）。但根据西夏王室拓跋氏的自述，他们的先世则是出身于鲜卑族系；我们联系一些现存有关史料看来，认为这还是可以相信的③。由

于拓跋氏和其他党项部族长期以来互相融合的结果，种族界限已经不明显，因此隋、唐、五代汉族人视拓跋氏为党项诸族中的一族，与乎宋代汉人统称西夏为党项，那都是不足为怪的。

公元六世纪末期，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纷乱局面，人民生活得着暂时的安定，党项羌人民也愿意同汉族人民同过和平生活。公元五八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归化”，次年他们的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到旭州（在今甘肃省庆阳县附近）请求定居下来，隋政府给以大将军的官号。公元五九六年党项羌虽一度进攻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东北），但被隋兵打败，纷纷降附，党项羌人民就与内地汉族人民和平地共同生活下来（《隋书·党项传》）。

统一不久的隋朝，因为隋炀帝（杨广）残酷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被农民起义军瓦解了。唐高祖（李渊）及其子太宗（李世民）继续建立了国号曰唐的统一国家。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人民比较能够安居乐业，党项羌人民越发增长着与汉族和平共处的热忱。公元六二九年，党项羌首领之一的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大受优待。唐朝就其住区设立轨州（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三，谓在松潘卫西境；按松潘卫在今松潘县境，属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授步赖作刺史。其他党项部落闻风兴起，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唐朝又为设置岷（jū 据）、奉、岩、远等四州（新、旧《唐书·党项传》）。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王溥《唐会要·党项羌》）。但另一名叫拓跋赤辞的党项羌大首领，和吐谷浑^④王室通婚，互相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公元六三四年，当唐朝大将李靖等率领军队进攻吐谷浑时，拓跋赤辞帮助浑主伏允作战，进行着最顽强的抵抗。

后来因为他的家族和党项羌人民厌战，才于兵败后请降。唐政府就其原住地区，分设懿、嵯、麟、可等三十二个羁縻州^⑥，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的节制^⑦。于是从现在青海省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列入了唐帝国的版图。

唐朝开国的同时期，吐蕃奴隶主政权从西藏高原上崛起起来^⑧。唐太宗死后，吐蕃的势力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散居在今甘肃省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许多党项羌部落，受不了吐蕃的胁迫和压榨，请求内徙；唐政府就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⑨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县），辖下的二十五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其原住地区为吐蕃所占领，留下来的党项羌人民，受吐蕃统治，改称“羁药”^⑩。

公元八世纪中叶发生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唐撤沿边军队入卫京师，吐蕃乘虚夺取河西、陇右数十州及西域的领地。于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被吐蕃切断了，唐帝国经常受到严重的威胁，步步走向衰颓。唐代宗统治时期（公元七六三年至七七九年），党项羌部落散居在灵、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县及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很多；由于住地和吐蕃邻接，不断出现联合进行骚乱的事件。唐政府为了隔离和拆散他们的联系，便把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省横山县）以东的地区；静边州都督府也同时移置在银州境内^⑪。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县）一带，也连续徙来了大批的党项羌人。当时居住在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作东山部落；居住夏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作平夏部落^⑫。后来作为西夏统治者的拓跋氏就是平夏部落里面的最显赫的大族。公元七六五年后，还有部分党项羌人驱着牧群一度东进到石州（今山

西省离山县)“以就水草”;由于忍受不了官吏的压迫,又逃回黄河西岸地区(新、旧《唐书·党项传》及《唐会要》卷八九)。

党项羌部落迁入内地以来,仍然过着畜牧生活,由于与先进的汉族的经济和文化相接触,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得到提高,产业发达,财富渐有积累;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引起了唐朝官吏对他们勒索侵刻,他们有必要保卫自己,却感到“器械钝苦”,因此渴望得到犀利的武器。他们用劲马善羊,来和汉族商人交换铠甲弓矢;武装既得到充实和改良,同时也就大大加强了党项羌部落从事劫掠活动的力量。唐政府虽一再颁布向党项羌部落出卖武器的禁令,实际上只是具文^⑩。这时唐朝统治阶级是非常腐朽恶毒的,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党项羌人民巧取豪夺;

“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全唐文》卷四七七,杜佑《论边将请击党项及吐蕃疏》),既不给予代价,而且尽情奴役,动辄杀伤;这样便不能不激起党项羌人民的怨怒和反抗^⑪。党项羌社会这时正处在家长奴隶制发展阶段,部落首领们对于财富的攫夺和占有,也表现出极度的贪欲,他们为了劫掠的目的便经常发生着毫无休止的纠纷和战争^⑫。因此他们的活动更为混乱时代增添了紧张的气氛。随着唐王朝中央权力的衰微和地方军阀内战的频繁,封建统治力量由于分裂而大大削弱;这时党项羌部落固然仍是处于不统一的散漫分裂状态^⑬,但就总的趋势说来,他们是比较顺利地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盛极一时的吐蕃奴隶主政权,到唐朝末年,由于内部战乱频仍,势力亦已衰落。公元九世纪中叶,张议潮领导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县)起义,把吐蕃统治势力赶出河、陇地区,唐朝一度恢复了旧时的版图(见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及向达《罗叔言

《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从此今甘、青、陕、川边区一带，吐蕃酋豪纷纷自立，形成封建割据的状态，实际已非藏区的拉萨政府的权力所能统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吐蕃居民，就是我们今天所称呼的藏族；但这些吐蕃居民的内部包含着土著羌人的成分很大，由于长期融合与同化的关系已不可能作出严格的区分，因此宋代汉族人也经常就把他们看成和呼为羌族^⑥。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吐蕃居民的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风习和党项羌基本上是相同的。北宋时代，横亘宋、夏两国的接壤地带，从仪州（今甘肃省华亭县）、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县）、泾州（今甘肃省泾县）、原州（今宁夏固原县）、环州（今甘肃省环县）、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县）、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县），以至灵州、夏州，都有吐蕃居民的分布（《宋史·吐蕃传》）。他们聚族而居，大的数千家，小的百十家，各有部落首领，不相统一；因此力量不能集中，在政治组织形态上便特别显得落后。宋琪在宋初奏论边事时说：“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宋史·宋琪传》）。后来韩琦也曾谈到：“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鹑、者谷、达谷、必利城、臈（同腊lǎ）家城、鹑（chī蚩）泉城、古渭州、龛（kān刊）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按实指中原汉族王朝。以后本书征引遇到这种加有引号的“中国”时，都是只具这种狭隘的意义）之患”（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修水洛城》）。这就是指的吐蕃。由于吐蕃同党

项羌在种族血统和生活文化方面都很接近，所以西夏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特别重视，作为争取的对象；而且事实上有不少的吐蕃人成为西夏王国的属民，其地位仅逊于党项羌人。

【注 释】

①在我国所谓“正史”里为党项羌作传，以魏征等所撰的《隋书》为始。此后刘昫、欧阳修等的旧、新《唐书》，薛居正、欧阳修的旧、新《五代史》和脱脱等的《宋史》都列有《党项传》。隋代以前，有过宕昌羌在今甘肃省南部地区（《北史》卷九六：“其地自仇池（今甘肃成县）以西，东西千里，席（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活动。魏收《魏书》卷一〇一、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九、和李延寿的《北史》卷九六、《南史》卷七九，都有《宕昌传》，而《北史》一书里更并列《宕昌》、《党项》两传。关于宕昌和党项的关系这一问题，胡昭曦同志撰《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认为在武都以西的宕昌羌和自青海东向的党项羌不是同种所出。但我阅读了上述各史的《宕昌》、《党项》诸传之后，觉得那许多记述其稍前或当代史实的史家们，是一致倾向于把宕昌和党项看作有同种关系的。例如：

第一，《隋书》和《北史》的《党项传》都明白指出：“其种有宕昌、白狼（郑樵《通志·四夷二·党项》作白兰，约在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一带），皆自称猕猴种”；可见两史的作者们，是把宕昌看作党项支属的。《北史》并列《党项》、《宕昌》二传，有兼详种属的意思。

第二，《魏书》的《宕昌传》（《周书》《北史》文同）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隋书》和《北史》的《党项传》也说：“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据此，宕昌羌和党项羌，从其种属所分布的区域来说，本是相同的，这样宕昌和党项便被当日的史家把他们结合起来了。

第三，无论《宕昌传》或是《党项传》，它们所记载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婚姻，以至风俗、信仰等无不相同；这也使我们相信宕昌和党项究竟不存在种族上的差别。

胡昭曦同志又说：“自永嘉至龙朔三年，吐谷浑立国达三百五十年之久，它绵亘于青海、四川西北及甘肃南部，占据了原来羌人之地，广袤四千余里，把在其东面的宕昌、邓至羌人，与在西南的白兰及后来的党项等羌人远远地隔绝起来。”这里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吐谷浑虽是鲜卑族所建立的国家，但它是以很少数的鲜卑贵族君临于上，所统属的部民则几乎全部都是羌族（所以宋人宇文之邵在他的《上皇帝书》中干脆地说：“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也。”见《宋文鉴》卷五三。文扶羌所居，实际就是原来宕昌羌的分布地区）。这些羌族少不了就有党项、白兰、宕昌诸羌在内，是一定不会存在“远远地隔绝起来”的事实（例如各史《宕昌传》和《党项传》所谈到宕昌或党项的广大分布地区，实际也同吐谷浑的国境是没有什么出入的，所以似不当理解吐谷浑的统治曾把党项、白兰、宕昌诸羌完全排斥于它的统治区外）。

至于宕昌、邓至失国后，“没有再见到这一带有羌人的单独活动”，我认为倒不必是被混合于汉族，而是失势的宕昌、邓至羌人为兴起的党项羌所吸收了。所以在宕昌、邓至衰灭之后，党项的势力便更抬高了。党项之名不是他们的自称而是汉族给予的称呼。

② 案新、旧《唐书》所记党项八部中的野辞氏，杜佑《通典·边防六》及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作野律氏。唐、宋以来文献中记载野利氏是党项羌中极有势力的大姓。《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党项》作野利氏，《宋史·宋琪传》，以南山野利和平夏拓跋相并称；同书卷二七六《尹宪传》也有“俄杀芦关及南山野狸数族”之语。这里提到的野利和野狸，就是《通典》里所说的野律氏。野辞氏的“辞”字疑为“律”字之误。

③ 西夏统治阶级自称拓跋氏出于鲜卑族系。公元一〇三八年元昊（夏景宗）公开称帝，在向宋朝所进的表文上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史·夏国传上》）。次年闰十二月遣使贺九言贺正书，又说：“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